

魏光焘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杨乔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8)

【摘要】: 魏光焘是晚清掌握实权的大臣之一,他先后在甘肃、新疆、云南、两江、闽浙等地任要职,每任一方都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创建新式学堂、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推广舆地教育、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魏光焘 近代 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 (2018) 05-0160-08

魏光焘(1837-1916),子午庄,清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金潭乡(今属隆回县)人。历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新疆布政使、护理新疆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他是晚清时期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历史人物,是湘军名将之一。但学界对魏光焘的研究少之又少。学术界关于魏光焘的研究论文只有寥寥数篇,分省对他的施政情况有所描述。研究成果少,关于他在近代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提及更少,对他的思想探讨不足。本文以魏光焘在各地实施的与教育相关举措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一、大力发展边疆教育,推进了中国西北、西南边陲地区近代教育的进程

西北、西南边陲地区,众多少数民族杂居,在清末时期经常发生民族冲突和动乱。1862年至1873年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地方动荡,人烟凋敝,加剧了汉民和回民之间的隔阂。同治六年(1867),魏光焘随左宗棠军转赴陕甘,光绪七年(1881)升甘肃按察使旋升布政使。在甘肃任职期间,据其自述“余经理其事,尽心筹布,如修道府、衙署、城楼、坛庙,建柳湖书院,创盐厘各局,设董志县丞城池,移屯垦行,牧政平治。凡三年,始先后一律告成”^{[1]6}。在恢复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提到的柳湖书院,位于甘肃平凉崆峒,原在战乱中损毁。

同治十二年(1873),时任平庆泾固等处地方盐运兵备道总兵的魏光焘,不仅修复了柳湖书院,而且将原来属于平凉府的柳湖书院,改成平、庆、泾、固四府(州)道台书院,推进了四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清代西北地区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少数民族很忽视,甘肃地方文化教育落后,魏光焘在平、庆、泾、固之间安置由陕西、甘肃迁来的回民,使这些回民子弟接受教育,有利于安稳人心,平凉柳湖书院的重建推动了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维护了民族团结。柳湖书院在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新修的书院中师资水平高,招收的学生多,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在西北新修书院10余所,其中魏光焘兴修平凉的柳湖书院最为伟大”^[2]。

光绪十年(1884),新疆改设行省。同年冬,魏光焘任新疆首任布政使,五年后升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在新疆期间,颇有政绩,为平定新疆、促进新疆的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使新疆纳入中国整个的政治区域中,一扫两千年来相互散漫、松懈的关系”^[3]。据其自述:“时新疆初设行省,百事创始。如修城郭、建衙署、设郡县、定官制、举军政、订饷章、整顿邮传,兴立学校,与夫开矿、屯田、畜牧、绘图勘界、立约通商各事,无不竭力举办,不敢告劳”^{[1]6}。

作者简介: 杨乔,女,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湖南地方史

经过长久的动乱,此时的新疆百废俱兴,“僻处边陲,教育落后,毋庸讳言”^[4]。他所说的“兴立学校”,具体而言,主要指的是新疆博达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上奏清廷,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北梁创立官办的新疆博达书院,获得批准。博达书院不仅授课讲学,也印刷出版图书。博达书院是新疆开启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才。

1901年5月他履任云贵总督,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建中小学堂于五华山等处,选士出洋游历,培植人才,颇费心力”^[17]。滇越铁路的开通使云南与外界联系较多,新式教育推广顺利。据中国海关报告:“1902年以后,云南在建立现代学堂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这一偏远角落缓慢地开始了改革。大理府、蒙自县、普洱府、昭通府、丽江府以及各州城和县城,都开办了师范学堂,更重要的是各地都开办了多少不等、成效不一的各种男、女学堂。所有学堂都免费上学,云南府中等学堂的一些专门科还免费提供伙食、服装、课本等。省城全部在校生可达7000人”^[5]。

在边疆任职,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民族关系,大力发展教育,选送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无疑是正确的举措,此举推进了中国西北、西南边陲地区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

二、开办新式学堂,促进与近现代教育的接轨

魏光焘是晚清时期的实权重臣,“素以严正方刚、老于军事自名”^[6]。他的地位决定了能熟知清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也对于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敏锐意识到晚清时期时局艰难,动荡不安,只有大力推广新式教育、广设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才能适应形势发展。无论他在何处任职都尽力贯彻这种想法。他为发展近代教育,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各地大量新修各种学堂,使旧式教育逐渐向新式教育过渡。光绪二十一年(1895),魏光焘升任陕西巡抚,“建格致、文武各学堂以植人才”^[16]。是他主政陕西的一项重要工作。魏光焘到任后,立即召集陕西学政赵惟熙,在泾阳县治附近动工兴建学堂,特意委派泾阳县学各官督理监修,要工人连日赶工,仅大半年的时间就修建好了崇实书院。书院规模宏大,四周空地较多,十分方便以后增添校舍和开办工厂。他对此也比较满意,上奏朝廷云:“命名曰崇实书院,中分4斋,每斋拟先设肄业生15名,兼习外国语言文字,并推算测量,以递及汽、化、声、光各学,以裕制器尚象之源”^[7]。崇实书院先期已经招收24岁以下的学生60名,分科学习,后来逐渐扩充至每年招收学生160名。

他在西安创办游艺学塾。游艺学塾是一个既教授旧式教育,又教授新式教育的学堂。按照魏光焘所言,学堂内的学生需要“参考时务,兼习算学”^[8]。游艺学塾每年共招收学生70名,算学是游艺学塾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

他认为陕西地处内陆,民风质朴,接触新鲜事物的速度不如沿海地区,因此“建学育才,尤为急务”^{[9]18}。只有大规模的兴建中等学堂,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新式教育,才能更好的发展当地教育。“诚以学堂一日迟设,即风气一日迟开,事关培植人才,自宜迅速筹办”^{[9]19}。为求学堂能迅速投入使用,借西安府试院当作学堂。使用游艺学塾原来购买的新式图书、原先聘请的测算及语言文字的教习,在全省范围之内招收学生,仿照大学堂普通初级各门功课,先行开课。

魏光焘对实业教育也多加推广,他意识到开办实业学堂对于发展经济、发展实业有促进作用。“窃维强国之道,首在富民致富之方不外实业,而振兴实业莫大于农、工、商、矿四者。近年东西各国于振兴此等学堂孜孜不倦,故财力日雄,国势日盛。非兴实业学堂不足以陶冶人才,以为振兴富庶之基。江南地广民稠,兴办犹不可缓”^[10]。他将江南格致书院改设江南实业学堂,分设农、工、商、矿四科,招收学生120名,分不同专业学习,并准备好各科所需的标本、仪器、材料为学生学习所用。开办学堂的经费常年支出,由商务局所储官商合办通州大生纱厂息银借拨济,保证了学堂的日常运转。

在清代,各地都很重视教育,但是传统科举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了,急需促进新式教育的推广。此时各地的新式学堂刚刚兴起,一切都要靠摸索,并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也没有合适的有办学经验的人才。但魏光焘一再强调新式教育至关重要,必须要

大力推广。他在南京开办增补普通学堂教育,并且三番五次地督促各府州县创办学堂,在他任内,新式学堂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在魏光焘和一大批官员的努力之下,在陕西、江苏、福建等地创建新式学堂,聘请懂西学的教师、开办新式的外语、测量、化学、物理教学课程,这些举措促进了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培养了大量新式理工科人才,使新技术、新观念得以迅速传播,让各地的普通民众受益匪浅。据中国海关报告:江苏、福建地区“教育问题被认为是取得显著进步的事业之一。1905年上谕鼓励新学、废除科举。许多新学堂一边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一边教授中国经典。为进行新式教学,聘用了外籍教师,购买了昂贵的仪器”^{[5]49}。

第二,开办三江师范学堂,选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培养了许多师范生,补充了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

三江师范学堂是清末时期全国规模最大,也是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学堂的开办意义重大。1903年3月魏光焘上任两江总督后,立即开展这项工作,为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举措,建造三江师范学堂所需的经费筹措、营建建筑工程、招聘培训师资、招考学生、大力发展教育等工作都得到具体落实。

按前任总督张之洞的设想:“筹办师范学堂,其购地建堂经费,由江宁藩司筹拨。所称常经费由江苏藩司及安徽两省统筹协助,并以江宁银元局岁获盈余专供该学堂经费之用。系为力筹远起见,应请该督抚照数拨济”^[11]。按照设想,学堂每期要招收学生900名,“宁属定额250名,苏属定额250名,安徽省定额200名,江西省定额200名,共定额900名等”^[11]。但是,魏光焘接任后发现实际情况是建校经费各方均告困难,难以筹集。不仅建造学堂的经费严重不足,而且学堂开学以后所需要的运营经费也难以维持。

筹款是建学堂最为关键的事情,魏光焘想了许多办法来积极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首先是从盐政、厘金、铜元收入中提款。据其回忆:“壬寅冬,奉调两江之命。到任后,首先整顿盐政,岁增款至200余万;厘金、铜元亦增出二三百万。提款建三江师范学堂”^[17]。两江地区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胜数,魏光焘非常有魄力的从盐政收入中优先提款来保证三江师范学堂的开工建设。

然后,将学堂原本计划招收的900名学员分三班依次入学,“经会商商务处,以原定三省学额900名可分三班召集入堂。”采取每次只招收300名学生的方式,所需的教室规模和学堂运行经费得以大幅减少。

最后,他将学堂的建筑样式由西式改为中式,先盖实用性强的房屋,其他房屋次第增添。魏光焘奏称:“该堂原拟物料装饰俱洋式。委员按式绘图需费银30余万两,若照详房间数改造华式约需银18万两左右,值此度支奇绌,不独造屋无此巨款,即将来常经费需款浩繁,亦恐难以为继,则建造房屋亦可次第增添,拟先就分班学生人数,择必不可少房屋分别起造,酌用洋式。核实估计,共需工料曹平银98500余两,拟于江宁筹饷捐输款内解存司库银58000余两,尽数动拨,其不敷银两,由司设法另筹”^[12]。学堂建西式建筑样式需银30余万两,而改为中式只需18万两,这几个举措节省了三江师范学堂的建校经费,使建造学堂的难度减少一些,使学堂的开建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魏光焘竭尽全力地保证了学堂开建的种种费用,从而使三江师范学堂繁杂的建堂工程能顺利开工并建成。自1903年6月19日起开工的三江师范学堂兴建工程进展顺利。即使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魏光焘也想方设法一一克服,至1904年9、10月间,工程全部竣工。

三江师范学堂基础工程建设的经费筹集以后,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就是招考教习,“盖中小学堂之学生程度日以加深,则师范学堂之教员养成者,亦刻不容缓”^{[13]130}。以保证学堂开学以后,有师资可以教学。他奏称:“三师师范学堂在全省规模最大,悉照原奏举办延请日本教习11人,考选举、贡、廪、增出身之中教习甲班40人,乙班30人。第一年暂借公所地方为练习教员之所,商订课程,互换知识,练习一年期满,各教员尚能恪守规则,核实讲求实验后,计留堂之中教习56人,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分别派为正教员、副教员、助教员,即以为师范各生之教习,专授中国经史、文学及地算、体操等学”^{[13]130}。

据此,1903年6月,三江师范学堂聘请了11名日本教习,70名中国教习。第一年不招收学生,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除了熟悉各自承担课程以外,还需要互换知识,双方互学对方语言文字。“令东教习就华教习为中国语文,华教习就东教习学日本语文及教育、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图画、手工、理财等学”^{[13][14]}。经过一年的相互教学,经过考核,共留下了56名合格的教习。此时中国教习略懂日语,日本教习略懂中文,以期达到教学时不用借助翻译,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的成效。

三江师范学堂建筑基本完工之际,学堂通知两江所辖各府州县,将举行两次招生考试。为保证教学质量,魏光焘又聘请了社会名望之士担任学堂稽查。例如:“江督魏奏三江师范学堂学务较繁,现延聘翰林院编修方履中为该堂稽查,考校课程一切”^[14]。

三江师范学堂所学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彩,领先于国内其他学堂,适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三江师范学堂有师范生70名,待新校舍落成后,再行增募。以后每年续招300名,以备毕业后遣往各署充当小学教习。其教科为教授法、文学、物理、经济、生理、数学、农学、理财、博物、绘图、手工、东语、体操等科,建筑规模极其壮丽”^{[12]2}。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以后每年招收大量师范生,所有学生毕业以后担任各州县中小学堂的教师,继续在州县推广和充实基础的新式教育,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魏光焘任两江总督的时期正是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时期。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筹备,1903年3月魏光焘到任后尽心尽力地组织实施了筹款、建造学堂、聘请师资、培训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极其重视教育,对于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的重要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此学堂视为三省中小学堂命脉所关。固不能不加意经营也”^{[13][14]}。魏光焘为推动江南地区教育而尽心尽力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8月14日,接任两江总督周馥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自经前督臣魏光焘、署臣端方极力提倡,承学之士,翕然从风”^[16]。

光绪三十年(1904),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他在福建仍然尽心尽力地推动当地教育的发展。“航海履任,整理军政、吏治、盐务,兴水利,修城墙,创文武各学堂,选士出日本就学,不遗余力”^[18]。

他上任以后,积极筹划为闽省筹款派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专科事宜。“圣鉴事以自强之目的端在育才,育才之方尤资广学,顺开通风气,培养人才非各省各署多设中小学堂。不可欲多设中小学堂非多储教员,不可欲多储教员非多派生出洋专习师范”^{[17]4}。晚清时期,各省风气渐开,留学之风盛行,自费出洋游学人数众多。

在这种风气之下,福建省仅仅选派了15名学生赴日本求学,他认为闽省选派学生过少,跟不上国内形势发展,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念福建为理学名邦,从前文教昌明,英贤辈出,士风较东南各省颇推朴茂,然当此世局变迁时艰日,亟固不能不存在旧学以端士习,亦不能不参新法以育通才”^[17]。在他看来,有更多的人学习新的知识,有更多的人成为了解中学西学的通才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尽力筹款选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专业。

不仅如此,魏光焘还组织人手对全省中小学堂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基本掌握了各州县学堂的情况。此前福建省所有学堂多未认真推行新学,即使有也不过将书院名目改为学堂,山长名目改为教习,敷衍塞责的情况居多,大多持观望态度。经过调查后,他认为福建省开办新式学堂有三难:一是无经费,政府没有专项资金保证新式教育的兴建。二是无教员,全省找不出几个懂西学的教师。三是无课本,全省没有适合中小学堂使用的教材。兴建新式学堂可谓是困难重重。

鉴于福建方言晦涩难懂,外地教师来福建难以适应,他认为最适合的办法就是闽省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学成之后回地方学堂充当教员。“臣已严饬各署,务必将学堂认真举办,经费设法妥筹,而学堂教员尤关紧要。福建语言全系方言,若用他省教习亦不相宜。除多派本省学生出洋专习师范以备教员别无他法”^{[17]6}。

他在省城师范、高等两学堂肄业学生中挑取年龄在30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参加选拔考试,择优录取40人公费派赴日本东京宏文经纬西学堂学习师范专业。官府愿意承担这批学生每年贰万银圆的路费和学费,使其在学习生活方面无后顾之忧。

忧。其目的在欲“以育通才”。

虽然教育经费难以筹集,但魏光焘认为这笔经费必须优先保证。“闽省库款空虚入不敷出,惟以学习师范为全省人才命脉所系,不能不竭力勉筹矣。飭由藩司无论何款项下,先行提款万余圆预交半年学费,以后陆续筹寄”^{[17]4}。他认为官府出钱送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譬犹士庶之家诸事务从节俭而至为子弟延师。就学则多费亦所不辞”^{[17]6}。想要达到教育普及的效果,只有尽量的培养出合适的教员,花费再多也是值得的。在他的主持下,福建省先期选派40名学生赴日本求学。

在他任云贵总督和闽浙总督期间,陆续选派了上百名学生赴日本专门学习师范,而这批学生回国以后,“大多数从事教师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聘在政府部门工作”^{[5]60}。

三、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光焘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期间正值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此时期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提倡新式教育、改用新式教育制度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1905年清政府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习”。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办学热潮,魏光焘作为朝廷重臣,自然而然的也会重视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重视教育的官员肯定不止魏光焘一人,但是他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和舆地教育,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光焘一生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外交上多和外国人有交集,深知“夷情”的重要性。他一生之中最光辉灿烂的经历,在于军事、外交方面的成就。如参与新疆建省、夺回帕米尔,甲午战争中率部抵御日军,“与法领事议修铁路矿务,费尽唇舌,始就范围”^{[1]6},“与外国交涉,则争回上海县黄埔口疏通河道之自办权利”^{[1]7},“交涉事,与日人清了数案无龃龉,完全国体”^{[1]7}等。他是晚清时期对国外情况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官员之一,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与外国人交涉时努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因此,魏光焘很重视新学的推行,学习外国的长处。

他认为学务大臣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各省应多派学生进学外洋,是非常值得倡导和践行的举措,朝廷培才兴学是“救数扶衰之盛举”。魏光焘清楚地认识到培养师范生对于发展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有合格的教员才能开设更多的中小学堂,而合格的教员的培养需要更多的人才去学习师范。“师范为国民教育根本,尤非速储教员不能望教育之普及也”^{[17]5}。毫无疑问,他这种重视教育、重视师范教育的理念在晚清时期是十分先进和有远见的。

此外,他推行舆地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志。重视舆地教育是魏光焘的特色。他希望中小学堂的学生不仅是对本国地理深入了解,同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地理知识有所涉及。“其用意欲使学者由形式以窥见外人立政殖民之大略庶几。爱国之志油然而生”^[18]。魏光焘一生南征北战,不仅在军队任职,而且在很多省份担任实职,对中国各地的地理情况、风土人情十分了解。他意识到舆地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对于人才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各类人员的舆地教育的推行。

首先,他出资刊印《海国图志》。魏光焘是魏源的族侄孙,也是晚清时期政府高级官员,他认为印行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的专著《海国图志》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知道世界各国情况介绍,于是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其他著作。他本人也著有介绍新疆风土人情和平定新疆经过的《勘定新疆记》。

然后,他审定校阅中外地图,推广舆地课本。“舆地一门最为紧要,令代均会在湖北省创立地图公会,提倡实学。将所成中外舆地全图底稿呈候审定,迅速付刊,以备各省中小学堂可用”^{[18]10}。各省中小学堂所用的中外舆地全图,全部由魏光焘亲自详细校阅,总共有68幅中国疆域地图,以求学生“悉本疆域天然之势”,这本图集里面还包括极为详细精确的外国地图,以期学生了解国外的情况。魏光焘认为了解边情、了解“夷情”、了解世界,知己知彼,以振国威是十分必要的,每个学子都有学习地理知识的义务。为此,他极力向各省中小学堂推行舆地课本。

四、结语

魏光焘是一位湘军宿将、晚清重臣,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魏光焘对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他重视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官数十载期间始终热衷于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甘肃、新疆、云南各地创办学堂,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定团结。在南京具体经办筹建三江师范学堂,选拔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福建任内一心促进中小学堂的创立,选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

他热心于舆地教育的推行,提倡实学。在各地兴办实业学堂,培养了各类专业人员,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魏光焘于“乙巳(1905)春,奉旨开缺,交卸回籍。”他回到家乡以后,继续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家乡捐学田、捐义田、修学塾、捐试馆租田,迭次赈捐巨款,历送春秋闾士子巷费”^{[1]8}。他在担任各地地方官时,具有卓越见识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政府财政空虚、入不敷出的不利条件下,总是优先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清末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加大教育投入的果断作风是值得肯定的,这些重视教育发展的措施直接促进了当地近代教育的发展,为全国很多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参考文献:

[1]魏光焘.湖山老人述略[M].邵阳:魏氏族谱.1939.

[2]古苞,刘光华.西北通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568.

[3]夏益赞.新疆建省的总检视[J].边铎半月刊,1919(2):15-20.

[4]徐戈吾.新疆之教育[J].新亚细亚,1925(10):77-7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海关十年报告选译教育改革史料.近代史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9.

[6]佚名.张之洞魏光焘恩寿之特色[J].江苏(南京),1903(1):131-132.

[7]魏光焘.陕西巡抚魏光焘学政赵惟熙奏设实学书院折[J].岭学报,1898(1):32-33.

[8]魏光焘.陕西巡抚奏设开办中等学堂折[J].岭学报,1898(2):11-20.

[9]魏光焘.陕西巡抚奏设游艺学塾折[J].岭学报,1898(3):17.

[10]魏光焘.两江总督魏光焘跪奏为改设江南实业学堂谨将筹办情形恭折具陈仰祈[J].农学报,1905(283):2.

[11]佚名.管学大臣张议复署江督奏建三江师范学堂折[J].湖北学报,1903(1):14.

[12]魏光焘.江督魏奏筹建三江师范学堂情形片[J].秦中关报,1903(6):11.

[13]魏光焘.两江总督魏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J].东方杂志,1904(10):130.

[14]魏光焘.江督魏奏三江师范学堂学务较繁[J].北洋官报,1904(32):11.

[15]佚名. 本国学事:纪三江师范学堂[J]. 教育世界, 1904(7):2-12.

[16]周馥. 周馥奏陈两江师范学堂情形折.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8.

[17]魏光焘. 闽浙总督魏奏派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并请编发教科书折[J]. 教育杂志(天津), 1905(4):4-6.

[18]魏光焘. 两江督部堂魏札两江学务处文[J]. 南洋官报, 1904(18):12-14.